

崇文学术文库

出土文献探赜

杨昶 陈蔚松等 著

崇文书局



本书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

运用『二重证据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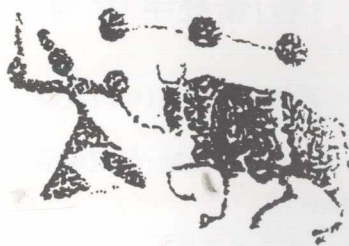
对多种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进行文字考释、

资料解读，探赜索隐，扶微发覆，

探讨了文献的文化意义，

论证考辨了古史，

是一部颇具独到学术见解的著作。



崇文学朮文库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书系

出土文献探赜

杨昶 陈蔚松等 著

崇文书局

K877.04
Y1

(鄂)新登字 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土文献探赜/杨旭等著. —武汉:崇文书局,
2005.6

(崇文学术文库)

ISBN 7-5403-0899-0

I. 出… II. 杨… III. 出土文物—文献—研究—
中国—文集 IV. K87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517 号

出版发行:崇文书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430070)

印 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 430074)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9.125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30 千字

印 数:0001 - 2000 册

定 价:16.00 元

序

张正明

华中师范大学的历史文献研究所是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创立的，门风谨严。杨昶、陈蔚松等教授是张舜徽先生的弟子，精研典籍，克绍门业。他们对出土文献深为关注，沉潜反复乎其中，历时既久，凡所撰作俱见功力。这本《出土文献探赜》荟萃了他们的前期研究成果，行将付印。我有幸先睹，趁受命作序的机会，说一说自己的感受。

古代曾有佚书出土，以孔壁藏书和汲冢竹书为最著。可惜原件早已荡然无存，抄本则有许多疑是疑非之处。久之，情随事迁，人们对出土文献就淡然待之了。

近一百余年间，出土文献才又受到了学者的重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殷墟甲骨卜辞和西北“流沙坠简”的重见天日，俱轰动一时，成为国学得以别开生面的因缘。此后，在地下沉埋良久的文献愈出愈多，使学者惊喜不已。

文运与国运相系，恰巧以20世纪的中心为界，出土文献的状况前后大异。

在20世纪的前半，绝大多数是盗掘出土的，恍若从天而降，没有在出土现场找到的相关信息，而且以甲骨文和金文居多，简牍尚少，帛书只有1942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这件孤本；在20世纪的后半，绝大多数是科学发掘出土的，挟带着绝非无关紧要的附加信息，甲骨文和金文的资料持续加多，而尤为令人振奋的是简帛激增，且其中有不少纯属学术著作的古籍，大

半是见所未见甚至闻所未闻的，这就使我们能够在研究中深入到古人精神世界的今人未详之处去，打开先前深扃固闭的户牖，审视古人的灵魂，从而改写中国古代学术史。

南楚似乎得天独厚，特别令人瞩目的几批文献都是两湖出土的。就简牍数量最多的发现来说，一是1996年长沙走马楼22号古井所出的三国时期简牍约9万枚，二是2002年龙山里耶1号古井所出的秦代简牍约3万6千余枚（包括少量战国楚简在内）；就学术含量最大的发现来说，一是1972年至1973年长沙马王堆1号墓和3号墓所出的西汉简帛，二是1993年荆门郭店1号墓所出的战国楚简，三是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买来的楚简——学者认为这批楚简也出自荆门或江陵的战国楚墓。

马王堆的简帛诚然重要，无奈一则受时局动乱干扰，二则因帛书本《老子》甲乙两本都与传世本《老子》大同小异，因而其学术冲击波不甚深远。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则不然，共有战国时期的学术著作不下20余种。这些著作虽在传世的典籍中有雷同的篇章和疑似的线索可寻，但都是新出的。其中《老子》三本只有2千余字，且其文辞与传世本《老子》多有出入。一经公之于世，迅即在中外学术界引发了两次强震。适逢政通人和之时，相关的中外学者莫不闻风而动，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大有争先恐后之势。

华中师范大学位居南楚腹地，其历史文献研究所对出土文献格外垂青是可想而知的。杨昶、陈蔚松等教授所做的，目前主要是对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二重校读”。他们恰像韩愈所讲的，“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如此积跬步以致千里，以后势将推进到对新本古籍的整合与研究，那就柳暗而花明了。对此，相信读者会有同感的。

2004年12月20日

桂子山

目 录

- 序····· 张正明(1)
“二重证据法”与近 50 年出土文献的学术价值(代前言)·····
····· 杨 昶(1)

甲骨文字编

- 甲文“江”字初考····· 陈蔚松(17)
甲骨文中的占候资料解读····· 杨 昶(26)
周原卜甲与《周易·蛊卦》····· 陈蔚松(41)
试论甲骨文的文化意义····· 王玉德(56)

金石文字编

- “犇强大于南汜”解····· 陈蔚松(73)
《国策》校证·金石篇····· 杨 昶(84)
鄂君启舟节与屈原《哀郢》研究····· 陈蔚松(90)
汉石经《鲁诗》残碑校史一则····· 杨 昶(126)
论洪适《隶释》《隶续》的文化意义····· 陈蔚松(128)

简帛文字编

- 郭店竹简《老子》文本分析····· 刘韶军(147)
郭店楚墓竹书文字考释(二则)····· 杨 昶(163)
楚简《太一生水》篇“青昏其名”释证····· 陈蔚松(168)
“有共德行”辨····· 杨 昶(182)

-
- 简帛《老子》研究述要…………… 刘国盛(184)
- 《国策》校证·简帛篇…………… 杨 昶(198)
- “羊唐”考…………… 杨 昶(232)
- “廉”德探源及古代廉吏标准
——以睡虎地秦墓简牍为第二重证据…………… 杨 昶(234)
- “曹傅川”订误
——《张居正文集》书牍题名校记一则…………… 杨 昶(242)
- 附录: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土文献研究论文索引……………
…………… 徐艳芳(245)
- 后 记…………… 杨 昶(285)

“二重证据法”与 近 50 年出土文献的学术价值（代前言）

杨 昶

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为国学大师王国维于 20 世纪初所创，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巨大突破。此法沿用至今，被众多学者奉为圭臬。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简帛文献的不断出土，“二重证据法”更加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造就了学术研究的一系列崭新成果，并为今后诸多学科领域的进步开辟了道路。

（一）

“二重证据法”的面世，与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考古的重大发现和学术进步的总趋势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它是时代的产物。

清末光（绪）宣（统）之间，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等陆续被发现，深深地震动了域内外学术界，极其充分地开拓了学者的视野，也为王国维创立新的治学方式、研究手段提供了客观条件和思维模式。虽然，“二重证据法”的正式提出和明确表述，见于 1925 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设的《古史新证》课程中，但是它从酝酿直至成熟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 1914 年，罗振玉、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及王国维此后写的一系列论文，凭借《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中的简牍资料，考辨汉代历史和西北地理，运用出土文

书结合传世古籍文献资料的创新手段，从而开拓了研治古史的崭新领域。此时，“二重证据法”初现端倪。《流沙坠简》在日本出版后，中外学术界为之震惊，认为是清代考据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的重要进步。王国维这一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开创性研究，贯穿于他的学术生涯中，诸如利用甲骨文、金文考辨《尚书》、《诗经》、《左传》、《史记》和殷商史，利用敦煌遗书考辨唐史，利用金石铭刻资料研究民族历史，等等，均系以地下实物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研究方法的产物。其代表性论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毛公鼎铭考释》、《大云经疏跋》、《西胡考》等所取得的卓荦成就，对近代的学术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王国维当然深谙其中原委，他曾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中吐露肺腑之言：“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① 足见当时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的意义所在。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社会正经历着一个剧烈的变革过程，学术文化正呈现着一种跃升的态势。当时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和著名学者，如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钱玄同、顾颉刚、洪业、陈寅恪等，他们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术研究的开拓者，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带有规律性的理论概括，自然也为“二重证据法”的诞生提供了学术氛围。王国维是一个思想充满矛盾的人，他在政治上倾向于封建保守，但“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的”（郭沫若语）。早年到上海进入东文学社学习日文时，王国维就接触了西方的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知识。1902年赴日留学，所修为物理学。嗣后执教四方，主讲过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课程。他深受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是认同的。另外，他出生在“弃儒而

^① 见《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第65页。

贾”的封建地主家庭，自幼接受传统的教育，具有扎实的国学功底。由于这样的学术背景，他的眼光必然不同于一般封建学者，许多传统的东西经过他用资产阶级观点分析研究，就能得出封建学者无法得出的新结论；在研究方法上，他怎甘墨守以往传统的考据手段呢？正如其弟王国华所言：“先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其疑古也，不仅抉其理之所难符，而必寻其伪之所自出；其创新也，不仅罗其证之所应也，而必通其类例之所在。此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也。”^①

1925 年，王国维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正式提出“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②

从《流沙坠简》到《古史新证》经历十余年，王国维的学术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阶梯，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嬗变，即规律性的理论概括。“二重证据法”并非仅仅停留在两种或两种以上资料的单纯印证上，而是看到了更深刻的东西，即“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在“地下之新材料”中，倒是存在着新的事物，成为肯定其实或否定其伪的准绳。

完成这样的学术建树，虽然与时代准备了前述两大客观条件不无关系；但从主观方面分析，只有王国维这样的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具备如此深厚的底蕴，对于历史文献拥有如此广博的知识，

^① 《王国维遗书》序三。见《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影印本）第一册。

^②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同时对于考古发现予以如此特殊重视的学者，才能开创这样的学术新途径。以“二重证据法”探索古代历史文化的真实状况，业已形成一种公认的学术榜样，对于 20 世纪的史学研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简牍、帛书的多次重大发现及其整理研究的不断深入，又一次彰显出王国维所提出的这一学术方向的科学价值。

(二)

20 世纪后期竹简、帛书资料的多次重大发现，造成了一股重大的冲击波，学术界对以往历史文化研究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反思；前所未闻的历史新资料，刺激了文化史、学术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诸多“兴奋点”，也为“二重证据法”大显身手提供了契机。兹列举其中部分引起学术界关注的、比较重要的简帛资料，并加以简要说明。

1956 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战国楚墓中出土战国简牍 229 枚，内容为遣策和竹书。竹书，即书写在简牍上的古书。长台关竹书有不少关于周公定刑罚的言论，可能是周公所著刑典。^① 一说，系《墨子》佚篇。

1959 年 7 月，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出土简牍 600 余枚、27400 余字。经过整理认定，其中 9 枚短简记有忌讳之类内容，其余长简系东汉本的《仪礼》。这是迄今为止能够见到的最早《仪礼》写本，用于传世《仪礼》文本对勘，可提供研究古代仪礼文化的准确资料，更是探讨经学流变的重要依据。

1972 年 4 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 4900 多枚竹简，内

^① 史树青：《信阳长台关出土竹书考》，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 年 4 期。

容为《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守法守令十三篇》等。同时出土吴孙子、齐孙子的两部兵法，使失传千余年《齐孙子》重见天日，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两部孙子兵法的一些悬而未决的争议。几部先秦兵学著作的发现，为中国古代军事史及军事思想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大量竹书的出土，为文献辨伪、辑佚、校订工作带来了新的资源，大大促进了学术史研究的提升。

1973 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竹简 2500 枚，内容为《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日书·占卜》等。这批儒学典籍的集中出土，不仅凸显了西汉社会儒家学说处于主导地位的态势，而且是一系列历史文化问题探究的有力证据，同时还为校订传世的古代文献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较早文本，如今本《孔子家语》一书，世间多以为系魏晋学者王肃伪造，而被定名为《儒家者言》的竹书文字却与《孔子家语》相合甚多，有的学者推定为《孔子家语》的祖本，从而可能洗脱《孔子家语》的“伪贗”恶名，并重新予以价值评估。而竹书《文子》则基本上解决了今本《文子》真伪问题的历史悬案。

1973~1974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 26 件、12 万余字，使世人惊叹不已。经过整理确认其中包括《黄帝书》、《周易》、《老子》、《经法》、《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等重要典籍。《黄帝书》和《经法》为汉代之后湮没已久的古佚书，是研究黄老之学的新资料，从中可窥见汉初思想文化之一斑。帛书本《周易》、《老子》与今传本在体例、文字方面均存在差异，是前所未见的不同文本。《战国纵横家书》是《战国策》写定之前的纵横家著述，或即《战国策》的原始文本之一；其篇章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多有类同者，为考订战国史事提供了原始史料。同时还出土了西汉简牍 617 枚，其

中 410 枚为遣策，200 余枚为医书。

1975 年 11 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简 1155 枚、4 万余字，包括《编年纪》、《语书》、《为吏之道》、《日书》及大量秦代法律文书。《编年纪》记载了秦统一六国的历次战争，可以印证、弥补传世史籍的有关内容；还涉及战国晚期各国军事，秦国的簿籍、兵役、地方官吏等制度，以及历法、记时等等。《语书》是秦南郡行政长官腾颁发的文告，及考核良吏、劣吏的标准。《为吏之道》辑录了有关官吏道德言行规范的格言，包蕴着儒家融合的倾向；《日书》则是反映楚地民俗的数术文献，并附有秦楚纪月对应表；这些简牍对于秦文化和楚文化的研究有较高的价值。至于秦律文书，确系空前的收获，秦自商鞅引入《法经》，改法为律，形成法家政治传统，“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严刑苛罚以治国。汉代人称其法网“密如凝脂”，照例是应有大量的法律法规。然传世的秦律资料十分匮乏，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简弥补了这一空缺。

1977 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十多种古竹书，计 6000 余枚，内有《诗经》、《周易》、《苍颉篇》、《年表》、《大事记》、《万物》、《作务负程》、《行气》、《相狗经》、《辞赋》、《刑德》、《日书》及干支表残片。简牍本《诗经》有别于齐、鲁、韩、毛四家诗，于传统经学之外独树一帜；而《周易》残简表明这是一个比帛书本《周易》更为原始的《周易》文本。这批简牍内容宽泛，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的宝库。

1979 年，四川青川郝家坪秦墓中出土了两件木牍，内容为秦武王二年《更修为田律》。其中一件严重残损，无法辨认，一件残损较少，字迹清晰，总计 121 字。青川田律木牍反映了秦武王时期土地制度的具体内容，补充了云梦秦简之不足，弥足珍贵。所以为中外史家所重视，研讨极为热烈。如有学者指出：从朱熹《开阡陌辨》之后，史家都支持朱熹的观点，认为商鞅是破

坏了阡陌，破坏了井田制，根据青川田律，“开阡陌”或“决裂阡陌”应是创置建立之意。^①一说，田律实际上标志着商鞅时秦的“开阡陌”，只是开拓旧的阡陌，并未废除以阡陌为田亩疆界的制度，相反还要维护。^②

1979 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中出土 300 余枚简牍，内容为：部曲、操典、军队标志、军功爵赏赐制度及行杀、处罚等，从中可以了解汉代斩首俘虏之赐爵制度。其中关于军队标志、旗帜的区别，与《尉繚子》内容相同，文字稍异。此外，还有《孙子兵法》佚文，与 1972 年 4 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文本不一样，很可能是 82 篇《孙子兵法》的内容。这些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1972 年及其后数年间，内蒙古居延地区发掘了 2 万余枚简牍。经整理，其中有重要的历史文献《苍颉篇》、《急就篇》、《论语》、《算术书》、《九九术》，多种形式的《历谱》、《医药方》及《干支表》，还有许多诏书、律令等残简。这些都为研究古代文化史、医药史、谱牒学提供了重要资料。

1983 年 12 月至 1985 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了两批简牍，共 2 千余枚。这批汉简以汉律为主，堪称为睡虎地秦简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充实了我们对汉代法律文化的认识。此外，有古竹书《奏谏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功令》、《盗跖》等及历谱。《奏谏书》是议罪案例的汇集。《盖庐》记春秋时吴王阖庐与申胥（即伍子胥）问答，实际上是申胥的军事思想著作，系兵家典籍。《脉书》、《引书》都是医家著作，前者是现行本《内经·灵枢·经脉》的一种祖本，后者是

① 于豪亮：《释青川秦墓木牍》，载《文物》1982 年 1 期。

② 黄盛璋：《青川新出秦田律木牍及其相关问题》，载《文物》1982 年 9 期。

讲述导引健身的专门著作，它们与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相辉映、相补充，对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价值不在帛书之下。《算数书》是早于《九章算术》成书的一部数学著作，它堪称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个惊人发现。《盗跖》内容为孔子见盗跖，实系今本《庄子·杂篇·盗跖》的较早文本。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竹简460枚，内容为《日书》、《墓主记》。放马滩《日书》是继云梦睡虎地之后的第二批秦《日书》，时代或早于睡虎地秦简。《日书》分甲乙两种，其中资料对研究秦的社会性质、刑法制度、农业生产、市场贸易、天文历法，以及秦文化特征，都是难得的文献，与云梦睡虎地竹简《日书》有相得益彰之美。

1986年11月至1987年1月，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竹简444枚，有字简282枚，总字数约15000字，保存较好，字迹清楚，内容为卜筮祭祷记录、司法文书、遣册等。这批竹简对于研究楚国的宗教、礼仪、祭祀文化，以及楚法律制度、土地制度，乃至楚国文字，都是极其珍贵的资料。

1993年，江苏连云港尹湾村汉墓出土竹简133枚、木牍24方，共4万余字，内容为《刑德行时》、《行道吉凶》等文献，及文书、簿籍等资料。有关文书简牍，记有汉代地方官吏设置的情况，为研究汉代官吏制度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而其中若干地名的材料可校订《汉书·地理志》中的记载的疏误。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战国楚墓出土竹简800余枚（有文字者730枚），共2万余字，有儒家文献《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六德》、《性自命出》、《成之闻之》、《穷达以时》、《尊德义》等，道家文献《老子》（甲本、乙本、丙本）、《太乙生水》，及散简《语丛》（四篇）。楚简本儒家文献中，《缁衣》与今传本《礼记·缁衣》内容大体相合；《五行》与马王堆汉墓帛书本《五行》基本一致；《鲁

穆公问子思》或系古佚书《子思子》的篇章；《唐虞之道》等 7 篇可能是《礼记》成书前的几个原始文本，或者属于佚书《子思子》。楚简本《老子》不分章次，统计文字数目为 2046 字，不到传世本的五分之二，分别见于传世本的 31 章之中，文序和一些思想内容都与传世本、马王堆帛书本有较大差异，是目前所见最原始的《老子》文本。《太乙生水》为前所未见的一篇道家文献，其内容是早期道家的宇宙生成论。《语丛》则是自孔子到孟子之间的一些佚文，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嬗变轨迹。郭店楚简对于研究早期儒家和道家的学术思想具有极其珍贵的文献价值，已经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①

1994 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一批战国楚简，共有 1200 余枚，3 5000 余字，学者称之为“上博楚竹书”。专家推断这批楚竹书出土自湖北江陵、荆门一带，时间在郭店楚简出土前后，因盗掘走私流失。上博楚竹书内容涉及 80 多个领域的古文献，原题署篇名已达 20 余种，其中包括《诗论》、《缙衣》、《孔子闲居》、《颜渊》、《子路》、《曾子立孝》、《性情论》、《易经》等。上博楚竹书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的战国典籍原始文本，对于研究先秦的历史文化及学术思想，都有难以估量的学术价值。如《性情论》阐述了天、命、性、情、道五者之间的相承关系，即“天降命，命出性，性生情，情始道”逐一派生，进而在人的道德修养、礼教、乐教等方面提出了有关理论和概念，这些对于探讨儒家思想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的。

1996 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了大量的三国孙吴简牍，总

^① 参见骈宇騫等：《本世纪以来出土简帛概述》（资料篇·论著目录篇），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1999 年版；王子今：《简牍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年版。

数在 10 万枚以上，至少有 150 万字左右的内容。走马楼吴简上有明确的“嘉禾”纪年，故这批吴简又称“嘉禾简牍”。嘉禾简牍的重要性，学者概括为“填补缺失，数量惊人”。^①有关三国历史的文献资料，流传于世的十分匮乏；而《三国志》有纪传无《表》、《志》，使学者要探讨相关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都会感到文献不足征，往往要从前朝（东汉）或后朝（晋）的制度去推测。关于孙吴历史的文献资料就更有限，以往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中又独缺吴简，所以嘉禾简牍的重大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从目前已清理出的部分简牍看，嘉禾简牍主要是经济类文书，内容为：卷书类，包括佃田租税卷书、官府之间调拨卷书；官府文书类，包括官府之间的文书往来、司法审理等；户籍类，包括编户家庭情况等；账籍类，包括记录钱、布、米、租税、俸禄等状况。嘉禾简牍的出土，不仅为研究孙吴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也给探讨其政治制度、职官制度、文书制度、历史地理、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更是三国史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重要契机。

2002 年 6 月，湖南龙山里耶古城出土秦代简牍 3 6000 余枚，经过整理，初步定为秦朝县级官府的文书档案，内容涉及经济、文化、社会、民俗等各方面；时间从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国之年直到他去世，一年不少。由于秦始皇在位期间大兴焚书坑儒，许多珍贵的典籍被毁，传世的秦代文献资料也极其有限，整个 20 世纪，出土的秦简总数不到 2000 枚。里耶秦简的出土，将使许多湮没已久的秦朝史事得以复活。如里耶秦简的记录表明，早在秦始皇统治期间，就已经设有“洞庭郡”，这使学术界质疑《史记

^① 胡平生等：《新发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的重大意义》，载《光明日报》1997 年 1 月 14 日第五版。